

福州文史集粹

下

FU ZHOU WEN SHI JI CUI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福州文史集粹

FU ZHOU WEN SHI JI CUI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州文史集萃/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6. 12
ISBN 7-80691-292-4

I. 福… II. 福… III. 文史资料-福州市 IV. K925.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463 号

责任编辑: 卢 清

福州文史集萃 (上、下册)

编 者: 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发行: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出版中心 12 层
邮 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50.875
字 数: 11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91-292-4/K·46

全套定价: 68.00 元

目 录

序	陈扬富
林则徐是反对割让香港岛的第一人	戴学稷 (1)
甲申抗法战役纪略	陈培锐 (5)
严复与家乡	陈子桑 (16)
“船政”人萨镇冰	萨本珪 (20)
怀念外祖父陈兆锵将军	沈 骏 (30)
福建“去毒社”	吴家瑜口述 林家溱执笔 (46)
林白水与辛亥革命	王植伦 (49)
辛亥广州起义与福建党人	郑贞文 (57)
辛亥广州起义生还的福州地区义士	林家钟 (70)
黄花岗史事摭闻	郑丽生 (75)
辛亥革命在福州	潘守正 (83)
辛亥时期福州民谣	李乡浏 邱思颖 (101)
民主爱国主义者林森	林炳钊 林祥彩 (103)
郑祖荫先生外传	潘守正 (106)
怀念辛亥革命先辈、我的外祖父郑忞辰	王 凌 (109)
忆黄花岗之役生还义士、先父吴适	吴 正 (114)
五四运动在福州	郭公木 (120)
弱国无外交 民气作后盾	王井文 (133)
“二七”烈士林祥谦	萧忠生 (135)
中山舰官兵壮烈殉国经过 (附: 中山舰《战斗详报》摘要)	吕叔奋 魏振基 (142)
闽江阻塞线	陈道章 (146)
闽海抗战片段和部分忠烈事迹	萨福简 (151)

大湖歼敌亲历记	原寿梓 (160)
五龙杀敌目击记	陈宜坚 (163)
福州救火会勇士抗日之战	林祥利 (166)
闽江口受降	傅应雄 (168)
参加接收在台日本海军经过	严寿华 (170)
回忆陈绍宽部长	程法侃 (175)
蒋家王朝统治下的福州政治经济总崩溃纪实	何 震 (181)
马江物资保卫战	陈公远 (188)
东岭战歌	林逸森 (193)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响应百万雄师下江南纪实	魏振基 (198)
记“长治”号军舰起义经过	陈学锋 (204)
艰苦而曲折的斗争岁月	林莹治 (208)
高歌达旦 起舞黎明	萨本珪 (218)
朱绍清将军谈福州战役	林微润 (223)
解放初期的协商委员会	黄万乐 (227)
回顾建国初期工商界代表人士的积极作用	张传栋 (230)
福州首家新华书店	林应麟 (234)
福建人民革命大学创办始末	黄步奎 (244)
解放初期的福州民歌小调	官桂铨 (251)
邓拓及其亲属	王铁藩 刘承礼 (259)
“一个很好的市长”	
——记严叔夏先生	吴修秉 (263)
真理苦寻根 矢志终成革命派	
——记周问苍	周运隆 (266)
唯有鞠躬尽瘁	
——访朱怪同志	高 翔 (273)
百岁自述	王兆培口述 王东麟执笔 (277)
中国航空业的摇篮	
——马尾飞机处往事	巴钟奇 王钟英 (285)
回忆解放前福州的航空运输业	张顺凡 郑景镛 (292)
邮电今昔	张奇萍 苏宝森 王能超 (295)
福州电话百年发展史	王能超 (302)
解放前后福州的马路和市内交通	杨 立 (311)

建国前后福州自来水工程纪实	黄忠苍 (315)
福州温泉	萨伯森 (325)
福州金银行业简史	林德炎 (329)
解放前福州的银行和钱庄	沈祖彝 林宪民 陈梓端 黄观云 (335)
福州的典当、代当和估衣庄	庄家孜 (340)
回忆解放前福建省银行的几件事	吴幼波 (347)
刘家企业兴衰史	王能超 (353)
罗家企业兴衰记	李益清 (368)
尤家事业兴衰史	尤德龙 尤德奎 (371)
回忆我家发迹到没落的经过	黄骏霖 (377)
叔父胡文虎创业记	胡尚增 (380)
耄耋忆当年	蔡友兰 (384)
福州名牌货集萃	曾逸康 (394)
福州农业五十年变迁小记	黄万乐 (413)
郑依姆从办互助组到高级社	林国清 (419)
整治晋安河工程回顾	高不危 (423)
“文革”前福州科技工作散记	赵文澄 (425)
我从事海平面研究的经过	林观得口述 黄武闽执笔 (428)
记沈元院士	盛星辉 (431)
船政教育 薪传不绝	
——船政学堂及其系列学校	张宝骐 (434)
回忆在马尾海军学校的亲历和见闻	陈念祖 (443)
在海军艺术学校的日子里	翁亨樵 (457)
马尾海军学校的招生工作	高孔荣 (460)
金家楼海校生活	周幼良 (464)
江山才子笔 天风如写读书声	
——福州螺洲观澜书院盛衰记	林 怡 (467)
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概况	陈怀祯 (471)
福州新式学校教育	林伯方 (476)
我与福州一中	朱鼎丰 (489)
培养科技幼苗	池伯鼎 (501)
我与福州职工教育	方炳桂 (507)
宛在堂的历史沿革和人祀诗人	郭道鉴 (515)

目睹马尾文化八十年	陈道章 (518)
福州文艺五十年	黄安榕 (532)
文物工作 辉煌一页	黄启权 (539)
十年大庆福建工艺美术晋京展出盛况	周哲文 (545)
难忘的五十年代文化之旅	吴迪 (547)
鼓山摩崖石刻	郑丽生 (572)
寿山石刻	潘主兰 (575)
著名国际法学家龚铎自述	吴兆鹏 (585)
我的墨池生涯	沈觀寿口述 陈滢辉执笔 (589)
郑乃珣的艺术历程	郑大幹 (592)
根艺创作三十年回顾	屠一道 (596)
闽剧泰斗郑奕奏	刘湘如 (599)
记一生坎坷的爸爸林芝芳	林秀英口述 吕舜玲执笔 (607)
回忆我的妈妈郭西珠	郭小玲口述 朱斐执笔 (614)
回忆伋艺生涯	陈润春 (625)
新旧社会福州医疗防疫工作纪略	庄劲 (629)
福州市卫生防疫五十年回眸	纪惠玲 (636)
福州中医半世纪历程	齐上志 (640)
回忆我向死神挑战的曲折经历	李温仁 (645)
记著名中医药学家、医史学家俞慎初	倪法冲 刘德荣 (654)
陈桐雨传记	陈辉清 (659)
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和奉献	潘明继 (663)
福建新民主主义时期体育轶事	何方生口述 王令执笔 (667)
顽强拼搏 为国争光	刘华金 (673)
福州满族旗营	伊通甫 (681)
清末福州三教案	郑贞文 林家臻 (692)
福州佛教概况	释梵辉 释传常 (700)
福州开元寺今昔	林家钟 (706)
福州崇福寺与日本长崎崇福寺	释梵辉 (711)
行云流水话前尘	释梵辉 (713)
史家麟护持鼓山涌泉寺十三年	屠一道 (721)
元丰陶塔史略	郑丽生 (724)
福州天主教简史	林泉 (728)
福州基督教天安堂沿革及活动简介	严子祺 陈怀祯 (736)

基督教在福州布道、办学和开设医院纪略	福州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小组 (739)
福建孤儿院回忆	邹天欢 (753)
刻在心中的信仰	薛平西口述 陈滢辉执笔 (757)
回忆爸爸陈芝美	陈寿华口述 严子祺执笔 (761)
从投身革命到出家为僧 ——记原闽赣省苏维埃主席杨道明	郑孝茂 (767)
福州侨汇史话	黄鹿谷 (771)
海外飘泊半世纪 落叶归根话当年	严孔昌口述 苏菲执笔 (773)
[附录1] 《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及《岁月如歌——福州政协50年》目录	(778)
[附录2] 1979—2005年编印的其它专辑类书目	(799)
后 记	(800)

“文革”前福州科技工作散记

赵文澄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科协“一大”，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科协）。科协的成立形成了我国“三科”协调的科学技术体制。所谓“三科”，第一科是中国科学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建立，当年11月1日就成立中国科学院，可见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科技工作的重视。这一科也泛指科研机构，当时有五路科研大军的说法，首先是中国科学院，其次是各产业部门的研究院所，第三是各省、市、自治区建立研究院、所，第四是各高等院校的研究单位，第五是为国防事业服务的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院、所。

第二“科”是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科委），是我国最高的科学技术行政机构，主要任务在于贯彻党和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决定成立全国性的科研机构，制定长期与短期的发展规划、重大研究课题，与外国政府签订科技协定等等。国家科委是在1956年制定国家十二年长远科技发展规划的后期成立的。

第三“科”就是科协，是科学技术的群众团体。学会是科协的基础。20世纪初，我国即有少数学科成立了学会，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两个全国性的科技团体，一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一是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经过科联、科普两个团体申请和中共中央批准，合并成立了科协。三科体制的形成，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虽然后来不断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三科体制对科学技术发展却起了不同程度的组织保证作用。

“三科”协调的模式，亦为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所仿效，福建省就有科委、科协、福建科学分院的三科一体结构，这“三科”统一在一个党组领导下开展工作。根据上述体制，福州市也逐步走上三科一体的路子，比之全国和其它地区还显得有些残缺不全。就记忆所及，我想简要追述如下，当然这些追述也是残缺不全，不是全面的总结。

先谈谈福州科学研究所。原来设想搞个门类较齐全的科研机构，实际上刚建立时条件就很差，是在圣庙（孔子庙）内的西南角几间木屋内，所长是医学专家丁兆星博士。因为他是搞医学的，与医学有关的两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一件事是办了一个养蜂试验场，成功提取了蜂皇浆，50年代后期福州搞成蜂皇浆的还有第17中学刘仰文校长和农学院养蜂系的龚一飞教授，蜂皇浆的研究福州市走在全国的前列。还有一件事是动员草药医献方。丁兆星博士每月召开一次草药医座谈会，交流用草药治病的经验，负责记录整理的是人民医院李楚銓医师。后来，丁兆星先生调任市卫生局局长，这件事也就不

了了之。研究所还来个副所长是厦大化学系毕业的杨位捷同志，根据她的特长，搞了一些轻化工新产品试制，更多的是为基层搞一些化验测定工作。最忙的时候，是全国盲目掀起一股“超声波”热，许多单位都拿土超声波到研究所来测定，其结果也无非劳民伤财而已。

再谈谈福州市科协。福州科协也是由福州科联和科普合并建立的，第一届主席是师大化学系甘景镐教授。由于科联、科普是归市委宣传部管理，后来科协、科委成立时仍然归口宣传部。在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科技人员还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所以科协及其所属学会的委员会、理事会的组成，必须形成三结合的结构，要有党政领导干部参加，体现党的领导，又要以工农劳模、技术能手为基础，再广泛吸收科技人员参加，对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有很多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好在当时分管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对地方科技工作提出为“两当”服务的方针，即地方科技工作必须为当时当地发展生产服务。根据这个方针，使理、工、农、医各个方面的学会能够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如农字头的各学会和农民一起搞新品种、病虫害防治、新技术推广的工作。很多新品种都是在专家指导下培育成功的，很多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都是技术人员为主搞的，但成绩主要都归功于农民专家，科技人员只能暗中欣赏自己的成就。工字头的各个学会，大部分都能动员科技人员在工厂以领导干部、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在所谓“双革”活动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虽然工程技术人员是“双革”活动的主导力量，而在宣传媒体和经验介绍中，科技工程人员几乎都是阻碍双革活动的反面形象。医字头的各学会围绕着医学发展的新技术培训等开展活动，理字头的各学会主要围绕数、理、化、生教学中的问题开展交流。科技人员虽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待遇，但在学会的推动下，还是做了不少贡献，发挥了科普工作主力军的作用。

市科委成立于1960年初，随着市科委的成立，形成了三科一体的体制，由科委、科协和科研所的领导联合组成了一个党组即市科委党组，市科委设有办公室、工业科、农业科、情报科。情报所和情报科合署办公，市科协秘书处与工业科合署办公。市科委成立后把促进各产业部门和基层单位建立健全科研试验、技术推广机构等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定期开会交流，及时向市和有关部门、单位领导反映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市科委在抓机构的同时还抓项目，每年编制市科技发展项目，向省科委、市政府争取一定数量的科研款项。这一条增加了科委凝聚力，使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到科委争取一定项目经费。市科委成立后，还把原来归属于市工商局的度量衡检定所，划归科委领导，成立了新的福州市计量标准所。市科委最具标帜式的科技形象，是在现在的湖东路建筑两座科技大楼，一个是市工业科研所大楼，增添了大量的设备，其中最现代化的设备是可放大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这在60年代中期中等城市中是非常罕见的。还有一个是市计量标准所大楼，其设备不但初具规模，也是全省一流的。这两座大楼建设安装完工之时，也是十年“文革”开始之日。我这个为新楼、新设备呕心沥血的领导者，成了靠边站的“走资派”，当时最担心的是那些来自不易的装备受到破坏。这里我想讲一件也

是当年发生的令人欣慰的事，以做为这篇短文的结尾。在广东工作、后来回闽担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的柯冲教授，“文革”开始后避“乱”回乡，他利用我们工研所的可放大十万倍的电子显微镜，进行龙眼树黄龙病的研究，其研究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工研所作为协作单位也沾了光，我为高科技尖端设备终于有这么一朵鲜花而激动。

[原载《选辑》第21辑。作者（1930— ），福州人。曾任福州市科委副主任、市科协副主席、市计委副主任、市政协常委，福建省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第三届委员会委员。离休后被中国科协和中国管理科学院聘为研究员。著有《以智参政》等。]

我从事海平面研究的经过

林观得口述 黄武闽执笔

我于1905年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县江田乡松下村。1931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地质地质系，获理学士学位；1935年赴美国西北大学地质地质系深造，1937年获理硕士学位；1937—1938年及1946—1947年在美国克拉大学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41—1943年任福建协和大学教授和训导长；1943—1946年任暨南大学教授，1947—1948年在美国埃姆利大学任讲师；1948年任福州英华中学校长；1952年以来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1981年在美国被联合国教科文 IGCP 委为国际海平面委员会中国工作组组长；1983年以来担任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海平面研究室主任、中国第四纪专业学会理事、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海岸河口学理事、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福建地理学会常务理事、福建海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在东京举行的 IGCP200 次会议上，还被选为海平面执行局国际八个顾问之一。

1949年我当选福州市人民代表；1984年任福建省政协委员；198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福建省民革顾问。

我出生清贫，一家五口全靠父亲在长乐县城当店员挣钱养活。我小时候根本无法上学，收成时节，经常跟随村里的大孩子们到田地里翻拾遗收的番薯和花生充饥。一次，正值秋收季节，我与往常一样，同一群穷孩子在沙土里翻拾番薯，忽然，来了两个传教士（后来知道他们是驻县城教会的美国传教士祝寿康夫妇），见洋人来了，孩子们纷纷跑开，我却留在原地，镇定自若地与其交谈。也许是传教士见我对答清晰，产生了好感，便用生硬的本地话问我：“想不想去县城教会学校读书？”我听到这种问话，怎么也不敢相信：是不是自己听错了？难道真有天上掉馅饼下来的好事？我以为这不过是教士同乡下小孩开玩笑。没料到祝教士竟跟随着来到我家，向我的父母征求意见。父母见有这般好事，忙不迭地点头同意。随后，祝教士就带我进长乐县城教会学校上学，还为我添置了蚊帐、鞋子等用品。

1923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州英华中学。我努力上进，品学兼优，深得校长、教师们的喜爱。当时我决心毕业后报考医科大学，日后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决定了我人生的道路。那是1926年毕业前夕，学校派我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 J·R Smith 前往永泰等地进行野外考察。在 Smith 教授指导下，我初步学会了观看、辨别山川、河流、褶曲、滑坡、冲积扇等各种地质、地貌现象，并研究它们的形成原因，推测它们的未来发展趋势。这次考察，改变了我原来以为地理就是

学地名的浮浅的看法,使我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经思考,我毅然放弃了学医的愿望,准备深造地理学。

毕业后,我经 Smith 教授推荐,于 1927 年进入北京燕京大学地理地质系学习。赴京缺乏路费,英华中学的一位教师,把寒衣送到当铺抵押,换了钱送给我。

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我仍然勤奋用功,刻苦学习,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第二年,学校破格录用我当学生助教,每月津贴 20 元。这使我原先的困窘状态大为好转,得以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英华中学、燕京大学教师们广博的爱心,深深地感动了我,致使我后来在英华当校长期间,做到了爱教育如生命、爱校如家、爱同事如手足、爱生如子。解放前夕,反动政权疯狂地抓捕在校的革命青年,我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脱险。我还曾以高薪聘请清华大学的航空系主任沈元教授,培养了陈景润、高由喜等一批出色的学生。

1931 年,我以优异的成绩于燕京大学毕业,经美国地理学专家巴尔博教授介绍,荣幸地被中国地质学会接纳为终身会员。从此,地质学会成了在学术上哺育我的“母亲”。巴尔博教授为了培养我的野外工作能力,回国后寄来关于张家口地区地质的博士研究论文专著,还附来 300 美元,叫我验证论文的观点,并启发我从事海平面研究。他告诉我:“福建是个地质、地貌特别是海平面研究的处女地。”鼓励我运用学过的知识,寻找福建海岸下降的实据,以证实德国地质专家李尔霍芬关于中国东南沿岸为下降海岸的观点。

我一回到福州,便捆扎行李,只身乘坐民船前往平潭岛,自费从事海平面考察研究。我借宿在渔民家中,食宿条件十分艰苦,常常只吃米汤充饥,猪就卧在床铺底下。通过考察,我发现了古海湾上升为湖、二层海蚀洞和海蚀柱、海峡成陆、红色砂层被抬升等海岸上升的实据。据此,我提出了福建海岸上升及多次升降的事实,否定了当时地学泰斗李尔霍芬东南海岸为沉降海岸的观点。1935 年,我在美国进修硕士学位时宣读了我《福州附近海平面变迁》的论文,明确指出福建海岸是上升的。当时,许多外国专家认为我乳臭未干,胆敢否认权威学说,纷纷提出异议,并拒绝发表我的论文。我毅然把论文寄回中国地质学会,不久,便在会刊上发表。我的论点引起了国外地学界的重视。后来经过地质专家多次考察验证,都更进一步证实:福建的海岸不是“下降”,而是“上升”及多次升降。1936—1937 年,我应邀先后参加了在美国伊利诺意州召开的地质讨论会和在新英吉兰区召开的地理学讨论会。

40 年代初,我在福州协和大学任地学教授,继续在福州、长乐等地区进行野外考察,探索海平面升降与河谷阶地形成的关系。我发现闽江中上游河谷形态的倒置现象,上游表现为长期受河流的侵蚀作用,下游兼受海水的影响,新的地壳抬升致使河流深切了年轻的河谷,还发现闽侯昙石山 35 米处有蛤蜊层,福州盆地下 30 米处有海泥,以及海侵海退的许多事实。根据这些考察资料,我提出了“福州湾”的概念,阐明“福州湾”的演化过程。50 年代,我对福建海岸地貌的成因进行了研究。福建海岸曲折,岛屿众多,陡岸弱谷广布。传统上都认为这些地貌特征是“海岸下降”所致。我经过研

究,认为福建沿海地质构造复杂,400—600米古高海岸线,是新构造运动断块差异升降的反映,并合理地解释了福建沿海400—500米的古高海线,又阐述了沿海存在传统上称为“下降海岸”的原因。我还发现在连江县云居山山顶附近的“海上飞来”巨石,罗源县城关西南的笔架山的岩石洞穴中均有牡蛎壳附着。而在现代海平面之下的古海岸迹也有牡蛎层。由于发生的地质年代不同,我提出了海平面多次升降的论点。

50年代末,我被错划为“右派”,下放搞资料工作。在六年时间内,我阅读了六千多篇有关地理的国内外论文,平均每年一千篇,每天三篇,并作了大量笔记。这成了我读书写作的黄金时代,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文革”后,我更深入地研究福建沿海海岸线,发表了《福建第四纪海平面升降运动》等论文,提出了第四纪以来福建海岸线是“上升为主,多次升降,因地而异”的新论点。

1981年,我应邀参加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召开的IGCP第63次海平面学术会议,被选为中国海平面研究工作组组长。回国后,经过努力,全国第一个海平面专门研究机构——海平面研究室在福建师范大学成立,我为主任。从此,我带领年轻的科研人员深入广泛地开展中国海平面研究。在长期研究工作中,我总结创立了发掘祖国文化遗产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海平面研究方法。还与助教孙亨伦(福州人,原在福建师范大学海平面研究室任研究员,现在美国乔治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合作介绍海平面基础理论与国际海平面研究状况专著《海平面》一书,并翻译了由国际海平面专家撰写的《国际海平面手册》这本工具书。1983年我应邀出席在东京举行的IGCP200次海平面学术会议。1986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科学统一大会及爱尔吉海平面会议。1991年8月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第四纪联合会”。会后经代表投票选举,我荣幸地被选入世界十位“第四纪联合会”荣誉委员。

由于我首创性地提出了古高海岸线、福州湾、古闽江等观点,以及发掘祖国文化遗产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海平面研究方法,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86年我荣幸地被列入美国传记研究所出版的《世界5000名人传》一书;1987年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成功的人们》一书。几年来,许多国家曾对我发出邀请,要我到国外工作,身在美国的子孙也要求我留在美国,我一概婉言谢绝。我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

[原载《选辑》第11辑。作者林观得(1905—2003),长乐人,曾任福州英华中学校长、福建师大教授、福建师大地理研究所海平面研究室主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民革顾问等。]

记沈元院士

盛星辉

沈元出生于1916年4月28日，祖辈是著名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子，父母亲殷切地希望他继承家传绝技，而沈元却选择了航空科学作为自己的志向，坚定地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他的大学生活是在战乱岁月中度过的。193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化学系。1936年，又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航空工程，实现他梦寐以求的愿望。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华北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清华大学师生被迫辗转于湘黔滇三省。在抗日的大后方，他于1940年完成了学业，由于成绩优异而留在航空系任助教。

1943年，他被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作研究生，攻读航空工程系哲学博士学位。英国博士学位一向以严格著称，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般需要三年时间。但他为了争取获得学位后能有一年时间去研究机构工作，取得实践经验后再回国，只用了两年时间，于1945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当时跨音速一直是空气动力学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又是与航空飞行由低速向高速发展密切相关的课题。他迎难而上，毅然进行研究。这一课题是从理论上探讨处在高亚音速气流中的物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局部音速和激波，通过画出流场图形，从而可掌握音速气流的规律，了解机体形状和产生激波阻力空间的关系，为设计高速飞机奠定基础。

这一研究目标是令人振奋的，而计算工作却是无比艰巨的。他在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和艰巨的研究后，终于对圆柱体在高速气流中的运动规律得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为此，他撰写了《高马赫数下绕圆柱的可压缩流动的理论探讨》的博士论文。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在于第一次从理论计算上，得出高亚音速绕圆柱流动的流线图、速度分布以及在某一临界马赫数以下流动，就可以加速到超音速而不致发生激波的可能。这一论点具有开创意义，对当时航空科学在高亚音速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引起了国内外航空界的瞩目。由于这些重要原因，他在伦敦大学接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被英国接纳为皇家航空学会的高级会员。此后，他在当时世界上最新发动机的研制基地——罗尔斯·罗尔斯公司实地考察学习了三年，实现了取得实践经验后再回国的愿望。

他钻研科学绝非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振兴中华，所以谢绝英国高薪聘请，坚持要求回国。他于1946年夏回到祖国，先后任清华大学航空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及航空工程学院院长。他一方面从事教学工作，一方面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从绕圆柱的

高亚音速流动的研究发展到绕椭圆柱体的高亚音速流动规律的研究，并注重理论研究和实验研究并举。他又亲自设计监造了一座椭圆工作段低速回流式风洞。这座风洞直到今天仍在北航的教学科研中发挥作用。

1952年，我国两所航空高等学府之一的北京航空学院建立后，36岁的沈元教授被任命为北航副院长。这是毛主席亲自签署的聘任书，他接到后异常激动，因为它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他的高度信任。从此他个人的命运就与北航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1952年到80年代他退下来的40多年中，他为航空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对北航的筹建、办学方针的确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师资队伍的建设、专业的设置以及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和实验设备的建设，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北航建校初期，举步维艰，一切几乎都要从零开始，但他无所畏惧，迎难而上。他知道繁重的行政工作必然影响他的科研，但他认为教育事业同样是党和人民的需要。办学必须建立好师资队伍，他亲自组织大批青年教师向苏联专家学习。1956年，他参加制定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后，预见到宇航事业和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迫切性，就同北航领导一起，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火箭导弹方面的一系列新专业。他还较早地注意到了电子计算机将会对整个工业包括航空航天工业发展起革命性的作用，于50年代末就选派一批教师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学习，并成立了解算装置专业。1958年以后，北航开展了新型飞行器（轻型旅客机、高空气象探测火箭、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高速靶机等）、高精度陀螺以及测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设计试制工作，设计和制造了超音速风洞、高空试验设备、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试车台、热应力试验设备等重大教学科研实验设备。这些成果的取得和主管教学科研的沈元副院长亲自指导是分不开的，和他历来主张将北航办成开放型的，既能面向世界，又能切合实际地培养第一流航空航天人才，科研与教育密切结合，同步发展，加强对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等治学思想都是分不开的。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批斗和侮辱。但作为已有十年党龄的沈元教授，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他抱着这样的信心终于挺过来了。粉碎“四人帮”后，他兴奋地说：“党给了我们新生，今天我们要将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在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里，更应加倍努力地工作，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充分表现了一位老科学家对党的忠诚。“文革”结束后，他虽已年逾花甲，却仍以更大的热情投到工作中去。1978年，在他的积极倡议并亲自规划下，招收了大量的研究生，开始了由培养本科生为主，向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并重的方向过渡。对研究生的培养，他提出的方针是：精选苗子，打好基础，严格要求，和科研任务结合，着眼培养能力。他不失时机地提出组建计算机系、管理系、数理系、社会科学系和外语系，积极主张建立研究生院，并亲自抓对外开放交流和师资选派培养等工作。

他既是科学家和教育家，又是社会活动家。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自1957年建会以来，他就是力学学会的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60年代初，他为了促进航空科学的科技交流，又积极领导筹建中国航空学会的工作，担任学会的第一、二任理

事长。80年代初,他当选为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数学物理学部常委。1983年,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以及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并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80年代以来,他作为航空界和学术界的代表,曾多次出国访问,开展学术交流与友好交往活动,开拓与国际交往的渠道。

1982年,他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对学校的整体规划、学科建设、教学和科技、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等方面,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继续为北航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他为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所作的突出贡献,航空航天工业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劳动模范”的称号。

他从教56年,和同事们一道,培养了五万余名中国自己的航空航天及其它建设人才。他和数学家陈景润的师生情谊被传为佳话。40多年前已任清华大学航空系主任的沈元,在福州探亲期间,由于海陆两路交通断绝,不能北上,他应母校英华中学的邀请在该校任教,当时陈景润正是他所教的高三班的学生。陈景润回忆说:“我能在事业上获得一点成就,除了党的关怀支持外,沈元教授关于科学的皇冠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而《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明珠的讲话,是启发我对数学产生浓厚兴趣的主要原因。”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1952年建校至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发展成为为航空航天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综合大学,成为全国培养航空航天人才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每当人们看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40多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都会想到老院长沈元教授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1996年5月15日上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行名誉校长沈元院士80寿诞暨从教56周年庆典活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及有关学会、研究所、基地的领导和代表出席了庆典,宣读了贺信、贺电、贺词。庆典气氛热烈隆重,充分表达了对沈元院士半个世纪以来的治学、育人成就及其为祖国航空航天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的由衷敬佩。

(原载《选辑》第17辑。作者:全国航空史研究会会员、顾问。)